

■新作聚焦

海子小说集《开头》：

“他拥有太多没有完成的开始”

□王东东

根据海子遗稿整理而成的小说集《开头》出版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海子创作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不用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构成了一个传奇，就像海子的人生一样——更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想象一种未完成的文学天才，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其写作理想。我曾在和友人的谈话中说，海子的早逝并非根源于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伤(trauma)，比如可以追溯到童年的创伤经验。事实上从他有关乡村和自然的书写来看，海子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他拥有完整的母爱。按照拉康的理解，这为一个人获得幸福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这和他急切甚至狂躁的写作意志不无关系，他的文学理想过于宏大，以至于不可能在一个人的成年早期完成，他需要活到歌德的年龄才能评估自己的创作得失，而他恰恰又是一个缺乏耐心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分明看到海子在其诗歌中为自己辩护：

幸福找到我
幸福说：“瞧 这个诗人
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
——《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椒树》

我以为，《开头》向我们透露了更多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将《开头》放到海子的整个创作中来考察。

“诗化”与“教化”：诗人小说的读法

除了爱伦·坡、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在两种体裁领域都留下杰作，诗人的小说似乎很少被认真讨论，仿佛只是其“诗余”的副产品。我们必须承认这可能是一种偏见，如果不指向文体就只能指向诗人：诗人们往往对叙事缺乏热情，而将小说写作视为一种笨重的体力活。在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度流行的“诗化小说”概念也无助于改变这一切，因为诗化小说往往意味着不是诗人所写，如果真的出自诗人笔下，反而没有强调“诗化”的必要了。无论诗化的意思是一种或浓或淡的抒情性，还是叙事结构或艺术性的缺失，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如果将海子的小说视为诗化小说，不是贬损的话，就是辩护罢了。

海子的小说有一半未能脱离第一人称，这不一定是种局限，正如《少年时代》中所说：“好，还是让我再从头讲起吧。当然，打架的事还是留到以后等我跨出自传的范畴进入伟大的现实主义大门塑造人物时再详细加以叙述。”其实，海子有意保留了自传的口吻和语气，正如世界上很多小说家最早的素材都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一样。在这个方面，小说家模仿了回忆录作者，而海子则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他自己，他真正的兴趣是他自己。在《少年时代》中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的形成，而在《河流的黄昏》中则是诗性自我的发现和诗人主体的塑造。因而，海子的小说至少有一半篇幅属于成长小说，确切地说是教育小说、教化小说或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这两篇小说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我猜想，在海子心目中，它们可以分别对应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但在这些小说中，几乎看不到1980年代大学生活的内容，这是有些令人遗憾的。但是，这也充分证明了海子教化小说的未完成性。海子在手稿中写道：“如果谁以后编辑我全部的小说稿子，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全集起名为‘开头’。”他固执地如此命名，本身就具有预言性或者说接近于谶语——他拥有太多没有完成的开始。

这里的教化是指民族与个体的自我教化，海子及其友人骆一禾共享这一理想。在《少年时代》《河流的黄昏》中则主要体现在一种个体的自我教化。《少年时代》的叙事口吻甚至叙事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后来的王小波，毕竟二人成长的时代有所重合，因而小说叙事中会有相近的时代氛围及相应的人物心理等内容。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小波意在批判社会，而海子的目的则在于自我教化。海子在叙述上的犹豫——对读者坦言相告——也能让人想起马原，另外几篇小说中的高原色彩强化了这一点。但我们知道，海子并无心力经营某种叙事圈套。在《少年时代》这样的教育小说中，海子不断提到他成年后

■评论



《开头》，海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3月

推崇的文学天才的名字，从而造成了一种使童年经验发生变形的双重视角。整篇小说的叙事也拥有这样的双重视角，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充满自省，与一种幽闭症似的“内在性”多少保持了距离。叙事者眼中的驼背少年有时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时又是尼采的骆驼。海子似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格”或心理小说颇感兴趣，“二十岁以后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一间或一间半的地窖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海子的宗旨仍然是“只留下我一人，沉浸在孤独、荒芜而贫穷的真理上”。在《河流的黄昏》中，我们可以发现海子对鲁迅及其《野草》的兴趣：“先生啊，你教给我憎恨，没教会我怎样表达爱情。”

这就是海子的“野野呼告”。

创作心理：再谈小说与诗

除了将海子的小说作为纯粹的小说来阅读之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种读法，那就是与其诗歌关联起来。二者都是对海子小说的尊重。除了与众多文学天才互文，海子小说与其诗歌之间构成了最大的互文性。《开头》的出版甚至打乱了西川在《海子诗全编》中对于《太阳·七部书》的编辑方式，至少让我们怀疑其正确性。《开头》中的《大草原》与七部书中的《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异常相似，应该是同一部作品的两个版本。西川当年在编者按语中也谈到，海子曾经想写一部名为《大草原》三部曲的长篇小说。

《大草原》带有奇幻色彩。叙事者在追逐一个名为“血儿”的女巫，她是贯穿整篇小说的女神形象，其中包含了女性崇拜与自然崇拜、原始崇拜与神祇崇拜。血儿之于《大草原》，一如罗摩之于《罗摩衍那》。罗摩充满了《罗摩衍那》，而相对于大草原这一巨大空间，血儿这一感性生命的象征却需要叙事者不断追寻。血儿还有血有肉，而猎人和石匠则是象征性人物，他们在海子的长诗中也出现过，但不是所谓的“天梯”上活动。老石匠在修建一扇石门，“如果世界少了这一扇石门，世界就不完整”。叙事者同时也是小说人物之一，则痴迷于“石头内部的夜，石头内部的舞神”，小说就是这样将隐秘情事与形而上的梦呓交织在一起。从《大草原》中衍生出的《你就是找不到我》的叙事则更为清晰，这是一篇具有博尔赫斯气息的短篇佳作。决定年轻主人公命运的复仇行动——决

诗集为筏，情怀证心

——读李少君《情怀集》

□郑晴心

如果说新诗的语言常常开阖奔放、灵动磅礴，像春风拂过大地一般焕新万物，旧体诗则受体制格律约束，表达更为内敛克制，与世间万物相融映照，自成一方精神天地。《情怀集》不只是李少君多年旧体诗作的编年汇编，更是他踏遍山河、行旅人生的心灵记录。诗集始终贯穿着一个步履不停的行者形象。他早期的作品意气风发，如“黄鹤楼头大道开”流露的少年意气与精神底气，成为其日后诗歌创作不断生长的内在根基。从湘江启程，闯荡南海，再到岁月沉淀后回望山河，诗集暗含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写作者如何在现实辗转与行旅奔波中，把年少时的理想抱负，淬炼沉淀为更宽广、更温润的人间情怀。

读《情怀集》，是读一部传统与现代相融、跨越山海的心史。诗人没有停留在自我闯荡海岛的传奇叙事与个人神化，而是慢慢把笔触从抒发个人意气，转向体察世间众生百态，从仰望天地长空，落脚到融入平凡人间烟火。诗中那位随口问“北方仔是哪儿人”的海岛姑娘，风中兰花悄然绽放的日常景致，都化作了她笔下鲜活生动的创作源泉，也与“天籁自鸣天籁足，好诗不过近人情”的诗学主张相契合。

他在悼念诗人张枣的诗作中，寄托了彼此与海天相伴的缘分记忆，又以“忧我他乡或迷路，叹嗟你走失人间”的感怀，道出行者漂泊内心的怅惘与悲悯。难得的是，年少时的理想初心，历经海岛生活历练、编辑职业沉淀与人

文学评论

海子小说集《开头》能让

我们了解海子创作鲜为人知的一面，也让世人得以重构他的写作理想。书中多篇作品采用诗体与自传体相结合的形式，是自我教化式的成长小说。海子的小说与诗歌之间呈现出高度的互文关系，展现出他的诗学理念、哲学思辨与文学追求。海子怀抱融汇民族与人类、诗和真理合一的宏大文学理想，留有诸多尚未完成的开端

斗——悬而未决，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从《大草原》开始，小说叙事转向了神话、史诗与传奇领域，《蒙昧时代》三部曲、《囚》莫不如此。海子未能“进入伟大的现实主义大门”，其笔调与日常生活现实渐行渐远，而频频向幻象致意。海子小说的最终趋向与其诗歌一致，那就是进入“伟大的幻象或伟大的集体回忆”(《诗学：一份提纲》)。值得一提的是，《大草原》中有不少精粹的章节段落，可以被视为散文诗。

《河流的黄昏》以“日记体”形式呈现了丰富的诗学观点。日记以讥讽的语气谈到的“小国寡民的诗人、小动物的诗人”让人哑然失笑，仿佛海子就在读者眼前慷慨陈词：“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然而，日记中有一段说法极具症候性，当诗人沉醉于《摩诃婆罗多》和《圣经》，“歌德又被囚禁一边了。因为歌德追求的是个人人生经历和完整的经验层次。而这两部史诗却超于个体的人而直入神秘的集体，集体的幻象、集体的经历和心”。这其实道破了海子创作转变的秘密，同时也昭示了海子个人心理甚至精神人格的转变过程。

无独有偶，威廉·狄尔泰也在《体验与诗》中这样论述歌德：“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指向无处不在的人格。”可以与海子对歌德的看法相互印证，不禁让人感叹海子批评眼光的毒辣深刻。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如此评价《浮士德》：“浪漫世界的抒情主体与古典世界的宏观背景终于结合在一个形象中。”虽然理解歌德的创作，但海子却未能做到这一点。海子更多的是一位现代生活的抒情天才，故而他才宣称“走出心灵”比“走入心灵”更困难。但在飞向古典世界的宏观背景时，却像歌德的人物欧福良(Euphorion)一样不幸陨落。这是艺术的罹难，更多源于诗人创作伟大作品的受挫心理。

海子诗歌和小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十余年前，我曾在《海子与形而上学的断裂》一文中谈到，在海子创作中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与生生不息的自然精神之间的矛盾，现在看来，同时还应该是古代与现代的矛盾。海子曾坦言，自己并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戏剧诗人甚或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诗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其宏大的诗学理想实际上无法满足于任何诗歌形式，也无法落实于形式，最终使他成为一位集众多“原型”碎片于一身的作家。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翻阅近期的文学期刊，一种鲜明的感受油然而生：不同代际的写作者们都在坚持以“诚”与“真”呈现生命的真实，在山川地理之间细腻地描绘一方土地的风景，在时空的穿梭之中深刻地刻画芸芸众生，执着地追寻着生命深处的褶皱与光亮。

数字时代坚守“具身写作”

在算法与AI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文学以其特有的具身经验与精神力量探照时代之光。马伯庸的长篇小说《修桥记》(《人民文学》2026年第2期)以县令修桥破局为线索，揭露地方贪腐与积弊，写为官者当以良知、初心与智慧坚守正道。艾伟的长篇小说《春歌》(上)(《人民文学》2026年第3期)以法官艾桓的视角为切口，深耕人物内心，在司法与人性的博弈中，以诚挚演绎人性的温热。界愚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下)》(《当代》2026年第2期)讲述主人公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后，与资本、权势的漫长博弈。那个“纯真年代”的成长史与创业史，最终化作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奋斗与和解。东紫的中篇小说《浪花朵朵》(《北京文学》2026年第3期)写出了当代人在利益、情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坚守。无论是细腻描摹个人的岁月流转，还是洞察时代众生和人间百味，虚实之间，故事里的人物不断于迷茫处境中确认生命的实感，在当下数字时代，人的情感经验之可贵由此凸显。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在地书写深情聚焦烟火生活，具体而微地书写大众的生存日常。《北京文学》2026年第2、3期的“万众写作·自然来稿小辑”栏目推出高默涵、程远、王星超、马慧娟、万宇轩5位非职业写作者的新作，他们以劳动中的具身经验为文学带来新的特质，拓宽文学的边界。《十月》2026年第2期“人间底稿——‘素人写作’作品小辑”栏目推出杨运祥、玉珍、阳琼、徐再文、朱建勋、张倩兰6位作者的作品。他们沉潜至生活深处，真实记录平凡人生中的细碎光阴。《中国作家》2026年第2、3期推出了“新大众文艺·康平小辑”“新大众文艺·聊城小辑”两个栏目。在刘希、于立春、张艳华、王向葆、谭登坤、老土、张述等19位基层写作者共同的地经验与日常观察下，地域生活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些写作者用朴素、细腻的笔触，参与山川地理间历史与现实的建构，在温馨的日常背后，沉淀一方厚土的生命情怀与时代精神。

以地理锚定记忆

文学中的地理图景是近年来热议的话题，作家笔下的作品在山川地理之间，见证着文明与时代的精神变迁。肖复兴的散文《深沟八记》(《北京文学》2026年第2期)将一个人的记忆与一座城的历史紧紧缠绕，将即将消逝的老北京的胡同视为几代人的精神坐标。丁帆的随笔《在西西里岛上》(之二)(《中国作家》2026年第2期)在西西里岛浪漫的风光中，以古希腊名城锡拉库萨为锚点，召唤流动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精神与集体记忆。程回的散文《归来》(《中国作家》2026年第2期)讲述了作者时隔半年再次回到海岛上的住处，在周遭的流转变化中细细体悟生命的伦常。陈蔚文的散文《和睦桥，江心树》(《青年文学》2026年第3期)以古桥“和睦桥”与江心中独立生长的树为意象，在历史风物与自然景观的交织中，书写时间的沉淀、生命的坚韧、人与人之间的羁绊。陈世旭的短篇小说《到无名岛去》(《北京文学》2026年第2期)通过一次由善意谎言而组织的文人聚会、一场对海南无名岛的想象与向往，完成了对写作者众生相的细致描摹。

怀着浓厚而绵密的情感，不同写作者将地域生活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熔铸为作品独特的风格标识。《人民文学》2026年第3期的“新浪潮巡礼”栏目中，写作者与地域之间的情感连接化为了某种时空回响。周宏翔的短篇小说《有只灰鸽来看我》在重庆的烟火气中塑造了混日子的陈胜期和嘴硬心软的陈烟惠两个典型人物，在吵闹和温馨中蒸腾出生活的热气；周睿智的短篇小说《今夜平安无事》以美好祝愿映照当代人内心暗涌的孤独和温情；林榆的短篇小说《你为什么不去购物》以消费主义时代的购物行为为切口，审视人被物化逻辑裹挟的生存状态；何春花的小小说《李东的拳头》与郑世琳的小说《爱情或乙女游戏》聚焦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前者写出一位普通男性的尊严挣扎，后者追问“爱”在仿真时代的真实性与可能性。《中国作家》2026年第3期的“科幻小辑”专栏推出了白乐寒、梁清散、余卓轩、冉也4位作者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追问一种新的时空诗学，呈现被暗藏的维度，在时间折叠中重组人的价值。

历史与未来的当代转译

在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在作家跨越时空的传统赓续之中，潜藏着丰饶的精神世界。在《中国作家》2026年第3期的“王蒙聊《聊斋》”专栏中，作品《鲁公女》以现代视角阐发书生张于旦与鲁公女跨越生死、“至情动天”的爱情故事，古典志怪故事在当代焕发出新生的时代精神，获得了颇具想象力的阐释空间。阎连科的长篇小说《聊斋第三门》(《中国作家》2026年第3期)同样取材于《聊斋志异》，其以康熙的梦境为舟，驶入《聊斋》的狐鬼世界，在真假虚实之中探究文学如何“以幻笔写真”。彭敏的《我是人间惆怅客》(《北京文学》2026年第2期)带领我们探寻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风流人物背后的惆怅平生，照亮灵魂深处的灰暗与辛酸。

在探寻历史的旅途中，红色基因的精神赓续与革命英雄的当代显影，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中国作家》在2026年第2期特别开设“建军百年军事文学专辑”栏目，陶纯的长篇小说《幸存者》讲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不得不带着一个孩子彭天佑出发行军的故事，经历一路上的流血牺牲，彭天佑成长为最小的红军。刘循文的长篇小说《恤·品》(《十月·长篇小说》2026年第2期)串联起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家族四代人80年的命运，在东北边境上见证国人在历史夹缝中的求生、抗争与牺牲。《青年文学》在2026年第2期推出了“新时代红色文学专号”，其中苏二花的短篇小说《雁门关伏击》表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人民的忠勇与血性，李前锋的短篇小说《一号坑道》以抗美援朝战场的一号坑道为叙事空间，凸显志愿军战士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不屈的爱国精神。

可以看到，从具身写作对数字时代的沉潜回应，到在地书写对山川地理与日常生活的深情锚定，再到历史与未来之间的精神转译，算法时代的文学力量，正源于对情感经验的深度体察，持续用“诚”与“真”确认人的主体性。正是这种对生命本真的坚守，使文学在算法加速渗透的当下，守护着一片不愿被技术简化的心灵之乡。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在AI时代拥抱「诚」与「真」

□张逸飞

(作者系广州航海学院文理学院教师)